

桃引無事

胡公石



胡公石



22.18  
HRL  
C-1

22.18  
HRL

抛引集

胡文清



34A-4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006号

抛 引 集

胡 如 雷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8印张 200,000 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5.40 元

ISBN 7-5434-1738-3/K·40

## 目 录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 1 )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的几个问题	( 9 )
关于国家理论的几点探讨	( 19 )
试论“民族同化”及其机制	( 28 )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 34 )
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中心使命	( 41 )
历史与现实	( 47 )
运用“角色”原理研究历史人物的设想	( 50 )
试论社会主义史德	( 55 )
一个值得努力研究的重大史学课题	
—— 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效益问题	( 64 )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 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	( 85 )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	(100)
论“东方土地国有制”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134)
如何正确地理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146)
谈谈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史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 如何看待典型性的问题	(155)
略谈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	
—— 统一、集权、专制	(163)
“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	(170)
关于唐代韩柳之争的几个问题	(178)

几件新疆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	(197)
历史研究法刍议.....	(205)
漫谈治学.....	(216)
瞻前顾后，左顾右盼.....	(225)
读《汪篯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	(228)
《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读后.....	(234)
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断.....	(239)
〔附录〕	
关于“史学危机”的思考	
——访胡如雷教授.....	孔洁(247)
后记.....	(253)

## 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几个问题

自从有人类以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都会发生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细致、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备到完备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必然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和变化，今天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以这样 的态度和眼光看待以往经典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以便为理论工作的明天做出新的贡献。

国际工人运动迫切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得新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求从理论上回答怎样认识目前所处历史阶段的革命形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求从理论上回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越大、优越性显示得越明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也越能起示范作用，助成革命斗争的高涨。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工人运动本身，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前后相承的若干阶段性特点，现在人类正面临着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种关键时刻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并进行总结和发展理论，不但条件已经具备，而且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受历史的局限，过去认为只有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才有资格和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他同志如周恩来、刘少奇、加里宁等也不能完成这一神圣使命，有些人甚至已经做出了理论上的巨大

贡献也难以领受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桂冠，至于其他理论工作者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经典作家都已相继逝世，目前在理论战线上思想非常活跃，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创造性探索，我国建设和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任务也促使理论工作者摆脱了“左”的束缚，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不能设想等到新的经典作家诞生以后再发展马克思主义，应当承认现在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时代，当今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和理论工作者是完全可以做出一定贡献的。

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呢？个人的粗浅考虑，重点问题似乎可概括为以下几个。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新阶段的问题

列宁所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这部名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了一系列新特点，并且根据帝国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内首先爆发和成功。正是由于这些理论掌握了亿万群众，转化成了物质力量，所以发生了“十月革命”。

但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经典著作写成于1916年，从那时到现在又经历了近70年，很显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从60年代开始，各国经济先后起飞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而这些概属列宁所未见，也不可能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所概括，甚至有的同原有的特征很不相同。譬如：“新技术革命”和所谓“信息社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使其经济、政治都发生了量变基础上的局部质变，虽然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但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其意义不见得小于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变化。再如跨国公司、欧洲

经济共同体这种超越国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也是20世纪初根本不存在的，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决不比资本输出在19世纪末出现时为小。再举一例，20世纪的黎明时期，殖民地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基本上瓜分完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有的殖民地在政治上纷纷独立，它们虽然作为第三世界还在处于被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剥削的地位，但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依靠“船坚炮利”和派遣总督去征服和奴役这些国家，而是利用自己拥有的科技先进的优势，采取技术输出的方式，剥削落后国家，甚至部分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也是附于技术输出的骥尾。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第三世界的国家要想真正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就必须首先在科技上独立；而如果要在科技上独立，就必须首先发展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材。单纯依靠引进技术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必须引进与自立更生并举。因此，教育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它不仅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竞技场上的一场殊死战，也是新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反剥削、求生存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战役。在经济学方面，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个人完全是门外汉，如果内行专家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会发现很多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我们应当运用列宁分析帝国主义特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却不能以“腐儒死章句”的态度看待那五大特征。

目前在理论界和群众中经常遇到提出的下列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在这些国家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吗？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处于垂死的前夕？它们的发展前景是什么？为什么那里的工人运动处于革命低潮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将怎样发展？当前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要想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引用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语录和单纯进行解释性工作，已经远远不够，只有认真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当前阶段的新特征，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才能产生理

论的力量，并为工人运动指出斗争的前途和策略。

## 二、关于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亲眼看到了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对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略事总结以外，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粗略地描绘一个大致轮廓，不可能在理论上做出更多的、更具体的和更深刻的概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经历的时间也不长，而且忙于应付当时所面临的外国武装干涉及国内很多紧迫任务，更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取得的经验和所犯的严重错误，所以也不可能在这方面进行更全面的总结。斯大林本人犯过一些错误，由于当局者迷及严重的个人崇拜，他自己也很难客观地、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以后，我国出现过大跃进”、“文化革命”及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政治舞台上有些骗子、野心家粉墨登场表演丑剧，个人迷信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度，政治生活多次陷于不正常的局面。在国外，不仅50年代爆发过“匈牙利事件”，而且今天有的国家竟然发生了阶级同党的对抗，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现在几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体制改革，原因在于普遍发现了严重缺陷：有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需要理顺；有的按劳分配原则贯彻得不彻底，局部地为按工龄分配所取代；价值规律普遍违反，形成了价格扭曲；官僚主义在部分国家成为流行的瘟疫，还产生了以权谋私的官吏……总之，从巴黎公社到现在一个多世纪，可以总结的成功经验很多，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的教训也应当正确对待，问题的关键是要对这些进行系统的总结，并使经验和教训上升为理论。对历时仅仅60多天的巴黎公社，马克思尚且能够当时就进行总结；对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经验进行事后总结，就更是义不容辞的事了。现在总结有一个非常有利的

条件，就是今天的各国无产阶级领袖及理论工作者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头脑冷静，过去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过去看不清的问题现在看清楚了，过去不能说的话现在已可以说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进行总结时曾经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七八十年来的历史，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没有很好贯彻这两条原则造成的。在理论上和形式上，没有人反对公民的普选权和罢免权，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才能使之真正行之有效呢？为什么在普选制下竟然会产生终身制呢？这正是须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国家干部与工人间的工资必然有差距，不可能完全相等；但差距多大才既符合公社原则，又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呢？这也是须要探讨的问题。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就会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由粗糙走向细致，由抽象走向具体，由朴素走向丰富。

### 三、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党尚未执政，他们不可能过多地考虑执政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发生分裂的时候，列宁在党的组织原则上做出了新的贡献。毛主席在一些著作中，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中都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有创见。但大多是强调从事正面的思想教育，很少谈到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怎样防止追求私利的人混入党内及采取什么有效措施防止部分党员和干部蜕变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是尚待探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尚未掌握政权，一般愿意入党

的人，都是出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满旧社会人剥削人的不平等现象；至于入党以后，则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迫害，甚至献出宝贵生命，根本无私利可图，他们经常处于考验之中，由于不断进行严酷斗争而得到锻炼。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执政党的地位带来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对待权力以及怎样防止被权位腐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怎样防止伪装成革命者的野心家及着意谋取私利的人混入党内的问题。前一类人，林彪和刘青山、张子善是其代表；后一类人，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过去几十年中通常强调思想教育，这当然非常必要，但毕竟教育不是万能，尤其对那些明知故犯的人，不采取组织措施，单纯的教育根本无济于事。这些蜕化变质的分子和混入党内的野心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伪装成正人君子，对上对下两种态度，所以受骗上当的往往是上面的领导，他们的本质在群众的心目中往往是一清二楚的。为了纯洁党的队伍，关键问题在于走群众路线，然而把走群众路线看成作风问题就难以保证，因此应当建立一套实行群众路线的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列宁的榜样是值得学习的，他同孟什维克的分歧，就恰恰产生于对组织原则的不同主张，而不是由于对党员教育方面有什么不同看法。至于采取什么措施和手段识别骗子和野心家，用什么办法在新的条件下对干部和党员进行考验，是一个须要在实践中继续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取得了经验，才能在理论上加以概括，丰富马列主义组织建设理论的武库。

党际关系也是一个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列宁的时代，不但党内斗争复杂，各国党之间也产生过不少分歧和斗争，现在冷静地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否应当总结：哪些斗争是必要的、应当的，取得了哪些经验；哪些斗争是不必要的或过火的，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各个党之间

的正确、健康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原则基础之上。斯大林逝世以后，各国党之间关系更加复杂化了，走过来的道路异常曲折。在这方面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如果做出新贡献，对当前及今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利莫大焉。

#### 四、继续吸收资产学者的“合理内核”丰富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主义从创建开始，就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一贯不拒绝资产阶级学者所发现的真理，那怕是局部真理，并且把它们先后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难道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资产阶级学者就再也没有创造出类似黑格尔、费尔巴哈所创造的理论上的“合理内核”吗？显然不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继续通过“扬弃”，把它们吸收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来，不能以“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内核”，不应当使自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

翻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这两部经典著作，其中涉及自然科学的部分所举的例子，水平超不过今天高中理科的教科书所包括的内容。从20世纪初到现在，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已经提出了“知识爆炸”的问题。科技的发展既影响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通过方法论影响哲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关于渐变突变的理论，关于认识论的理论，有很多都是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总结，符合唯物主义的原

则，但是截止目前，把这些新结论、新成果加以改造和“扬弃”，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库的工作还没有认真进行。应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尽管世界上出现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理论和结论，但就理论体系而言，还没有一个比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更完整，水平更高。但是如果不能把这些新的“合理内核”加以吸收和消化，就会使马克思主义显得落后于时代，甚至在某些人中产生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错误看法。把这项工作做好了，马克思主义就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理论力量，掌握世界上的亿万群众。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情况，在这方面实际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化和“宗派性”，究其原因，盖同“左”的思想与教条主义倾向有关。在这种思潮和倾向的影响下，经典作家没有讲过的东西不敢讲，自然不敢创树新颖的理论；资产阶级学者的东西不敢去沾边，只能连小孩带洗澡水一起泼掉。因此，要想在这方面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须要具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须要克服“左”的思想和增强理论的勇气。

综上所述，今天从事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工作，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只要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动思维机器，实事求是地大胆探讨和研究，一定可以做出重大的贡献，并由此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前进。

(原载《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4期)

##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 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肯定，社会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即社会生产的基本因素。二者间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成份。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就他们从事社会生产和进行阶级斗争而言的。但是多年以来，史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存在重生产关系而轻生产力、重阶级斗争而轻生产斗争的研究倾向，并且在有关生产力的问题上存在争论，至今未彻底解决。因此，今天从探讨生产力出发来全面分析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仅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正于大家。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乞专家与读者不吝示教。

解放初，大家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只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至于经济基础是仅包括生产关系呢？还是也包括生产力呢？思想上并不明确。后来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似乎只有生产关系才能算作经济基础的论点占了绝对优势，普遍认为生产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才能使折光达于后者。但另一方面，也始终有个别理论工作者认为生产力亦应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所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仍有旧话重提的必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把社会形态构成的要素区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目的就在于：首先，明确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其次，肯定上层建筑也能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如果生产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对后者直接起作用的只有生产关系，那么把生产力排斥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也未始不可。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论点经不起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检验，因为生产力有时在某些场合和条件下，确实也能对上层建筑起直接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意识具有阶级性，而这一点与生产关系直接有关，很难把它同生产力直接挂起钩来，这确实是事实。但不可否认，某些社会的习俗、审美观点却同生产力密切相关，并不取决于生产关系的状况怎样，因为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因素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包括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怎样，既与生产关系有关，也与生产力及从事生产的形式有关。同样处于原始社会，一个部落从事渔猎生产，一个部落从事畜牧业生产，就生产关系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但二者间的生活方式却有明显的差别，从而其习俗和观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在相同的封建生产关系下，山区的农民同平原的农民由于单纯的生产环境不同，也会产生彼此意识上的差别。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列举了下列事实：有的“野蛮人”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非洲许多部落的妇女在手上脚上带铁环，作为装饰品。这种不同的美感显然来源于前者从事狩猎，后者正处于“铁的世纪”。再如布什门人（南非的一个原始民族）和澳洲土人从来不用花来装饰自己，这是由于狩猎的民族在其装饰品中“完全没有植物”。普列汉诺夫根据大量事实得出结论：“艺术发展是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因果联系的，虽然并非总是直接的联系。”（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0、11、12、32、114页）再如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及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的

研究和预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变革的条件下，社会政治决策制度、政权结构、家庭生活及人们的意识都将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且不少变化现在已见端倪。这同样说明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

近年来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也属于生产力，尽人皆知，哲学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人类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与科技发展水平有关，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之一，且后者对前者的作用也是直接的，并不完全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其中有一部分须要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间接地体现于生产力，但同时也应当承认，意识形态、政策等等直接对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的情况是存在的。封建王朝横征暴敛的政策同轻徭薄赋的让步政策，对历代生产力发生的不同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对科学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也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理论、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都能直接作用于工人和农民，影响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其创造性。教育作为上层建筑，能直接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对提高生产力也能起直接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以教育立国”而终于形成经济大国的实例。

既然生产力同上层建筑之间，既存在间接的、也存在直接的作用和反作用，就不应当把生产力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因此，经济基础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

## 二

近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注意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因而在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管理属于生产

关系范畴，有的学者认为属于生产力范畴，可见这一分歧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应当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辨明。个人作为经济史工作者，愿在这里谈谈粗浅的、极不成熟的看法。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关系的本质不同，经济管理的方式随之产生差异。所谓管理，必然体现管理者同生产者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及其代理人肯定居于管理者的地位，所以管理必然体现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关系。随着剥削关系的不同，管理方式和方法也就不完全一样。譬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是以棍棒和鞭子管理生产者，强迫奴隶从事集体劳动；封建地主是以份地制或租佃制的方式经营地主经济，农民则从事个体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虽然也经营大生产，但使用的却是不同于奴隶的雇佣工人，因而与奴隶主的管理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经济管理无疑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社会的经济管理办法对生产力也发生明显的作用，如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高于封建社会，但管理是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作用于生产力的，它本身并不就是生产力。

在看到此点的同时，也应承认，经济管理也还有属于生产力范畴的一面。为了说明此点，试举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包买主管理与手工工场主管理为例。在包买形式的高级阶段，包买主向分散的手工业生产者不但包销产品，而且提供生产工具和原料，生产者的所得相当于包买主所付的工资。在工场手工业管理形式下，手工工场主提供生产工具和原料，手工业工人领取工资，产品全部归手工工场主所有并加以出卖。就生产关系而言，这两种管理方式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基本相同，但在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生产力水平却发生了霄壤之别。在包买主的管理下，手工业者是进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家内劳动者间分工水平极低；但把数十名手工业者集中到手工工场中后，作坊内部之分工水平就大为提